

刘 炘 著



贝格士

黑河大发现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贝格曼黑河大发现

刘 炘 著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贝格曼黑河大发现 / 刘炘著.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98-0956-3

I. ①贝… II. ①刘… III. ①居延汉简—考古发现—史料 IV. ①K87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0463号

责任编辑:吴 江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180千

印 张:14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956-3

定 价: 36.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序言

xu yan

杨 镰

40年前，我来到新疆做“天山牧马人”，在西部大地有一个外国年轻人总“伴随”在我身边，那就是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为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成就，我们组织翻译了他的学术著作《新疆考古记》（1997年）与西部考察纪实《考古探险笔记》（2000年）。

沃尔克·贝格曼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瑞典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籍考古学家。1927年初，贝格曼刚从乌普萨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铭文。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柯曼博士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西部作至少一年半的考古。那时，重返亚洲的斯文·赫定正与中国同行筹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设置了一中一外两个考古学家的位置，贝格曼没有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查团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度过了青春岁月。——可那不是一年半，而是整整八年，从24岁到32岁。1946年，贝格曼因病去世。1927年至1935年，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行程数万里，三分之二的旅途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大部分无人定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310处古迹、遗址。仅发现“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就必将名垂史册。

1930年，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居延边塞——额济纳河（“黑水”）流域发现了万枚以上的汉简，学术界为之震惊。当时，有人将这一成就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中国20世纪两大考古发现。随之还出现了一门学问：居延汉简研究。

1934年夏天，贝格曼靠罗布人的帮助，在罗布荒原的库姆河支流，发现了一系列楼兰早期墓地，其中最重要的，是神秘的“小河5号墓地”。“小河5号墓地”有数以百具棺木，有王陵般的气势，其中包括“睡美人”——“楼兰公主”木乃伊。贝格曼随意为那无名河起了一个名字“小河”。如今，“小河”与楼兰古城，都是罗布泊荒原古今环境变迁的关键词。

在西部，我多次与贝格曼“相逢”：1984年在米兰罗布人的村落，1998年在老阿不旦，2001年在“小河”，2003年在额济纳、明水、马鬃山，2006年在罗布泊北部的乌塘村与“一家村”兴地……。贝格曼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他为东方文明感召，耗尽青春岁月，辨认着中华文明传承的DNA。当年的西部，条件艰苦，连一张完整的地图也没有，远离家乡亲人，当地群众的理解支持是他的精神库存。仅他发现的文物便可以充实一个博物馆，他到过的地点，许多直至今日还没有“追随者”。

我曾与一位瑞典友人谈起新疆，20年前我们在塔里木拍摄过一部电视专题片《斯文·赫定的路》。交谈中提到贝格曼。我们都注意到：瑞典读书界竟然不大记得这个敬业的学者了。瑞典的名人人物传记、词典等工具书之中，几乎都没有他的位置。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可以说在不长的一生贝格曼实际只作了一件事：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探险，在中国西部走了前人不曾走过的漫长路途。但我们都相信：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必将成为中国西部名副其实的领港员与史官。关心西部的人不会忘记贝格曼。

刘忻先生的新著《贝格曼黑河大发现》，使我们的期望落在了实处：在中国，贝格曼没有被忘记！刘忻先生以自己的心血为他构筑了一具纪念碑，成为他的同路人。

作为关注西部历史命运的人，读过《贝格曼黑河大发现》，贝格曼就不再仅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新疆考古记》的作者，而是我们的先行者。而刘忻先生也不仅是一位作家、艺术家，而是有宏观意识、同时具有探索精神的时代的记录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居延无法遗忘

juyanwu fajiwang

(自序)

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和角度，也很偶然。去年我的《玄奘瓜州历险之谜》一书出版后，在金塔县得到传播。不久，得到金塔县领导的反馈，他们非常希望我也能像对瓜州一样，帮助金塔做一些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金塔的知名度。我被他们的恳切和实在打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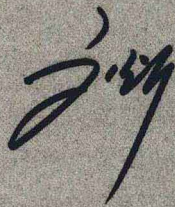
我的脑海里闪出了 80 多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绵延几华里的驼队身影。在茫茫的戈壁里，他们迎着风雪艰难跋涉；在炎热的沙漠里，他们昼伏夜行蜚居草丛；在蜿蜒的黑河沿岸，他们穿行废墟探查古城。取得了诸多方面的科学成果，其中发现了上万枚汉简，轰动了国际考古界，和敦煌藏经洞文书、殷墟甲骨文、明清故宫档案并列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四大文化”发现之一。在不断地筛选、排除和聚焦、放大中，一个人终于久久地停留在我的眼前——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

贝格曼的生命轨迹很短暂，只有 44 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在中国西北开展考古和研究。1927 年，24 岁的贝格曼大学毕业，他被著名探险家、科学家斯文·赫选定定，到中国西北参加由中国和瑞典两国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展考古工作。在此后三次长达 8 年的荒漠戈壁里，他先后发现了上万枚珍贵的汉代居延简牍、罕见的新疆若羌小河基地和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的汉代明水要塞。剩下近 12 年的生命尾声，全部投入到了中国西部历史考古的研究中，直至去世。贝格曼是“居延汉简”的发现者，是居延文化的传播者。

文物有界，科学无疆。今天，古代居延地区（甘肃省金塔县和内蒙古

自治区额济纳旗)因居延汉简而闻名遐迩,走进居延就走进了恢弘的居延文化,看到居延汉简就会想起它的发现者——沃尔克·贝格曼。我很同意学者杨镰的见解,贝格曼“虽然不同于白求恩、柯棣华,但对关心中国西部、随时准备投身西部开发的人来说,(他)也绝不应该被忘记!”本书仅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截取和再现了1930年前后那一年多时间里贝格曼发现居延汉简的情景以及笔者沿着贝格曼的足迹所看到的80年来的变迁。因此无意对贝格曼本人做出全面评价。

决心投入写作,也属必然。长期以来,我对居延地区比较熟悉,曾进行过多次踏勘,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和写作情感;其次,我积累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和文史资料,特别通过积极的寻访,得到了贝格曼和当年一批中国科学家子女们的大力支持。况且从来没有人聚焦过贝格曼这个人,接近他也是个探索;再次,退休生活使我有可贵的时间。它能促使我去找资料、进图书馆、敲击按键、拜访学者、到实地采访考察和在行进中构图摄影,是一种既动手、动腿、又动脑、动嘴的最佳运动。正是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我开始了拙作的探索。



2010年春节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 曲



011

第一章 揭秘蹊跷的老鼠洞



049

第二章 标定游移的居延泽



091

第三章 破解宏大的“汉文库”



127

第四章 走进候官的驻防城



157

第五章 开启尘封的“档案室”



195

尾 声



211

主要参考资料



212

后 记



序 曲

xugu

定格中国

dinggeshongguo

1927年的初春，内蒙古高原上依旧弥漫着冷月寒霜般的气氛，在凛冽的寒风中，枯草摆动着身影哀鸣，阴洼里，是一片片还未消融的厚厚积雪。一连串洪亮的驼铃叮当声从老远传来，打破了眼前的寂静。一支有300多峰骆驼的庞大驼队奇异地进入当地牧民的视线。整个驼队的驼峰上没有茶叶，没有布匹，也没有日用品，却满载了400多箱仪器、工具、图书、行李、帐篷和食物。更打眼的是，当地人从未见过的一些深眼窝、高鼻梁、黄头发的白种人，还携带着枪支和望远镜。他们从绥远省的包头出发后，径直西行，向着黑河下

游的额济纳河三角洲方向缓缓地移动。

在这支长达几华里的驼队里，有一位24岁精明英俊的外籍青年，在此后的8年时间、曾三次深入中国西北的沙漠戈壁，进行考古研究和发掘，最终他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于1930年至1931年在居延地区发现了上万枚汉代简牍，1933年又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发现了著名的小河墓地。这两项考古成就轰动了全球考古界，一举改写了世界考古学的历史。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他的人生很短暂，24岁大学毕业，之后在有限的19年里，将前8年献给了中国西北荒漠戈壁的考古工作；后11年里，集中进行中国西北考古的成果研究，之后与病魔抗争，直至离世。他就是瑞典青年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而这支规模空前、史无前

☑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庞大的驼队



例的驼队，正是由中国和瑞典政府共同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在中国，他是一个陌生人。令人费解的是，在瑞典国家档案资料里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在瑞典四处寻找贝格曼的资料，没有任何收获。他感叹地说：“看来在瑞典和在中国情况差不多，贝格曼的知名度远不及那个同名的电影导演。”然而，他是不应该受到冷遇的，“那是因为，他不长的一生实际只做了一件事：在中国西北从事考古探险！”“这个异

► 1934年冬天在新疆时的贝格曼



国青年虽然不同于白求恩、柯棣华，但对关心中国西部、随时准备投身于西部开发的人来说，（贝格曼）也绝不应该被遗忘。”

定格贝格曼的人生，他与近代瑞典著名探险

家斯文·赫定的联系不可分割。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贝格曼和他的导师斯文·赫定一样，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都非常及时地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决定了未来之路，同样，他们最终都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中国西北、交付给了大漠孤烟。当时中学毕业后的斯文·赫定，已深深被马可·波罗、郑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詹姆斯·库克、亨利·斯坦利、罗伯特·彼利、阿姆斯特朗等一批探险家的探险生涯所吸引和激励，他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为终生献身探险事业做好了一切准

▼ 参加考察团的中国团员离开包头前合影。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袁疆、袁扬 提供）





▲ 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
(1865—1952)

备。这时，一位俄国工程师向赫定发出了邀请，邀请赫定去巴库为自己的儿子当家教。对陌生世界充满好奇和幻想的赫定，打开地图一看，呵，巴库竟是那么地遥远，沿途要经过波罗的海，还要踏上俄罗斯广袤的土地，经过充满异国情调的彼得堡，这不就是一次欧亚大陆的美妙旅行吗？他当机立断应诺，毅然决然地离家南下。而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就是这次偶然的南下，永远地把他定格在了神奇的中亚大地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正是他在中亚和中国土地上几十年不断取得的地理学、考古学领域惊人的学术成果，造就了他的伟大事业，也奠定了

瑞典人在世界学术界一席重要的地位。

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向往，1927年1月的一天，24岁的瑞典青年沃尔克·贝格曼刚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正在彷徨时刻，他突然接到了陌生人的电话，对方自称是瑞典国家古物管理局柯曼博士。他在电话里问贝格曼：“小伙子，你愿不愿意参加斯文·赫定博士在中国组织的科学考察团，考察的时间是一年半，月薪880瑞士法郎。考察团里安排两名考古学者，一名瑞典学者，一名中国学者。”“哦，中国！遥远的东方，神秘的国度。”贝格曼一听要去那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度，一个充满东方传奇色彩，充满着历史谜团的泱泱大国；不仅要途经漫长的亚洲腹地，最重要的是能与自己崇拜已久的著名探险家、科学家斯文·赫定前辈在一起，这可是求之不得啊。在贝格曼的心目中，斯文·赫定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传奇式人物，他简直就是神。早在1890年底，25岁的赫定随着俄国人的一支驼队，由俄国的东部小城奥希进入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国。1893年10月16日，赫定又在瑞典国王和诺贝尔先生的资助下，第二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帕米尔高原考察，他多次试图登攀有“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

▼ 斯文·赫定和贝格曼在蒙古包里

(摄影 陈宗器)



格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首次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和喀拉墩遗址，并对罗布泊的演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然而就是这次探险之旅险些让他命丧大漠。1899—1902年，也就是贝格曼刚刚出生之际，赫定第三次进入中国，他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发现了震惊世界考古界的楼兰古城。永不知疲倦的赫定又于1906—1908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历经千辛万苦，走遍了冈底斯山脉的西藏西南部。如今这位令人敬仰的老师已经62岁了。他一直孑然一身，把自己的情感全部献给了这片土地。正如赫定说的，我把亚洲腹地比做自己永远的新娘，我已和中国结婚。眼下这次应该是他的第五次中国之行，也许是他晚年最后一次在中国西北的告别性考察。自己正当年轻体壮，还犹豫什么呢？“当然是必去无疑！”贝格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柯曼博士。人生充满着未知，也充满着机遇。就是这么一次简单的通话，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走向，把前途未卜的贝格曼与中国西北紧紧联系了近二十年的光阴。

人是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的，它取决于各种极其复杂和极其微妙的因素。贝格曼的这一决定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贝格曼1902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在高中的社会专业毕业时，曾梦想成为一名军官，但是在进入了军事学院几个月后，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一本由奥图赫瑟于1917年写

的书激发了他献身探险考古的灵感，忽然间他对历史和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1923年，贝格曼进入了乌普萨拉大学，一心扑向了考古专业。人是环境的产物。贝格曼从小就生活在北极圈内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维京民族为了生存奋进冒险的性格与航海探险的精神早对他有所熏陶，有所激励，也有过深深震撼。他的毕业论文就曾围绕着十二三世纪北欧海盗的一系列铭文展开，后来得知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在中亚的传奇性探险经历和瑞典地质学家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J·G 安特生在中国河南、甘肃和青海的重大考古发现，深受震撼，坚定了他的考古激情与探险冲动，他一直期盼能在赫定的麾下做一名考古探险家。

斯文·赫定的探险考察是多方位的，起初他并没有把考古放在第一位。偶然的，他被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成就所折服。1906年至1914年安特生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安特生应中国北洋政府邀请，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到中国协助

寻找铁矿和煤矿。他在河南、甘肃和青海等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迹中取得了重大发现，由此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被人们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这次，斯文·赫定本人则对确定悠久丝绸之路的确切位置和走向异常感兴趣，并认为考古研究在这个方面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为此，他求助于我们开篇所提到的柯曼教授，请他寻找一位愿意献身中国西北的考古学家，共同努力在这次科学考察中能有所发现。

1927年1月底，贝格曼已经坐在了斯德哥尔摩经柏林和西伯利亚去北平的列车上。



1926年末，斯文·赫定带领着一批由德国人组成的探险队来到中国，这是赫定的第五次来华考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年轻的贝格曼却难以知晓，自己投身的这个考察团的形成却有着一段非常曲折的过程。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赫定接受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一条德中航线做必要的沙漠测量和气象等方面的考察。赫定想借此机会，进行考古、地质、气象等多方面的科学考察工作。为此，他与时任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的翁文灏以及学者丁文江等取得联系，并向北洋政府提出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徐炳昶（右）和瑞方团长斯文·赫定（中）、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左）一起研究西行路线。

（摘自杨镰《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图说》）

考察申请。当时，北洋政府除对建立四座永久电台未予批准、飞行计划在第一阶段暂不考虑外，顺利批准了考察计划。翁文灏代表地质调查所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一项协议，赫定从而取得了到中国西部考察的通行证。然而消息传出后，北京学术界一片哗然，因为协议中“只容中国人二人负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须即东返”和“关于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这两条，引起强烈不满。显然，考古发掘的文物是个敏感话题，其归属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这个时候，赫定博士还带着西方探险家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就可以无条件地到中国西北考察。他哪里知道，经过五四运动和现代科学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对19世纪以来一些西方探险家对中国文物的大肆盗掘、掠夺和

破坏行为深为痛恨，十分警惕，对大量的珍贵古物流失海外，痛心疾首。他们已经觉醒，自觉组织起来捍卫古老的中华文明和科技主权。3月5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文学会、中国画学研究会等11个学术团体，召开了北京各学术

团体联席会议，并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对考察的主办权等问题提出六条明确的原则，同时发表了“反对外人随意采取古物之宣言”。对此赫定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得不停下脚步，耐心地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多次谈判。斯文·赫定毕竟是一位执著的、务实的科学家，与以往一些不择手段肆意盗窃中国文

物为目的的探险家不同。开辟航线是航空公司的目的，而考察探险才是他的真正愿望。权衡利弊后，他最终采取面对现实的做法，尊重中国人的情感，顶着西方学术界中的一些压力，答应了中方的一系列关键要求，毅然同意和中国科学家一道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一起开展科学考察。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达成了关于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十九

▼ 额济纳荒漠里有很多胡杨树，它们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

(插图 刘妍)



条协定。其要点包括：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接受斯文·赫定的资助，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该团的一切事务；考察事项主要是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团员由中外科学家组成，中外团长各一人；考察时间的行止和工作时间由两位团长商议规定；人员的工作分配，须两位团长相互征得同意；与地方长官的接洽事务由中国团长主持办理，

考察所需的食品、物资、人员、驼畜、医药、运输等旅途所需的费用均由斯文·赫定担任；遇到重大事项，须请示理事会审查核准方能执行，事关中国国防的事物，一概不得考察；所绘地图比例不得大于三十万分之一；不得以任何借口毁损历史、美术之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购买古物；考古采掘的物品，统须交与中国团长，运归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地质方面的物品，经理事会审查后，送一份副本给斯文·赫定博

士，协议还对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发表正式报告以及出版方法、费用等做了若干规定。1927年4月20日，经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第九次大会决定，推定当日主席周肇祥为代表，与斯文·赫定于4月2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签字。后来贝格曼的儿子简·格曼说：“为了获得必要的许可，赫定也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得带上并支持由中国科学研究院选出的十名中国成员，五名是科

▼ 戈壁组的成员在旅途中合影。从左至右是哈士纶、贝格曼、约翰逊、霍涅尔、拉尔生、赫定、陈宗器、贝歇尔、艾瑞克森、赫美尔。（摄影 蒙太尔）



研人员，五名是学生。”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科学考察的第一份平等协议，从此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饱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压迫之苦的局面。在推动合作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刘半农曾兴奋地戏称，“十九条协定”是一个“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9日，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人群沸腾，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在一片欢送声中，踏上了前往包头的列车。出发时，考察团共有团员28人，其中中国团员10人，瑞典团员6人，丹麦团员1人，德国团员11人。当时的中方团长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徐炳昶（又名徐旭生）担任，徐炳昶曾留学法国，任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5年3月，在轰动一时的政治性周刊《猛进》担任主编。外方团长则由斯文·赫定担任。考察内容有地理、地质、考古、植物、动物、气象、民俗、人种等。中国方面共有10人。除团长徐炳昶外；还有清华大学地质学教授袁复礼；国学研究所助教、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与古生物学者、北京大学助教丁道衡；研究地图学的水利工程师詹蕃勋5名学者。另外还有历史博物馆摄影师龚元忠及北大学生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4名学生。欧洲团员有18人，分别是团长斯文·赫定；考古学者贝格曼；医生兼人类学者赫默尔；瑞典地质学者那林；瑞典来华20多年的拉尔生为队长，丹麦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印章

（袁疆、袁扬 提供）

传教士哈士纶为副队长，负责考察团的具体事务，在中国出生的瑞典人生瑞恒负责后勤事务和翻译。此外还有11名德国人为航线的开通做各项准备，包括气象学博士赫德；会计米纶威；摄影师李伯冷；飞行员钱默满、狄德曼、海德、韩普尔、马学尔、华志、马森伯、冯考尔，这些德国人到新疆后不久，大部分都陆续回国。在整个考察过程中，中国的3名文物采集员白万玉、靳士贵和庄永成作为辅助人员，为考察团做了大量的采集工作。还有共计30多名随从辅助人员。

另外，在西北科学考察团1929年组织的第二批考察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磁学者陈宗器加入考察团，一直到第三次考察结束。1930年，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郝景盛参加了第二批西北科学考察团，1931年中央大学地理

